

由非現代政治的難題到在地策略*

評《我們未曾現代過》

林文源**

From the Problematic Nonmodern Politics to Local Strategy

Notes on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by LIN Wen-Yuan

關鍵字：科技研究、行動者網絡理論、非現代性、體論政治、混種物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ctor-Network theory, nonmodernity, ontological politics, hybrid

* 本書中譯本《我們未曾現代過》即將於2011年，由群學出版社出版。

** 服務單位：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通訊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E-mail: wylin1@mx.nthu.edu.tw

摘要

《我們未曾現代過》是科技研究(STS)中的重要著作，也是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主要理論建構之一。Bruno Latour在本書以混種物的中介，據此提出可變式本體論、物的議會、非現代性等主張，以解決現代主義的主客二分。

本書引起許多爭議。除了與其立場、風格有關的批評外，許多評論針對本書的政治承諾，尤其是非人行動者的政治性問題。不同於既有評論，本評論對非人政治性的爭議，並不擬提供一個超越時空的剖析。本文指出由STS提出的社會政治脈絡到ANT的本體論政治意涵，作為理解本書的脈絡，並指出ANT對於貫徹STS的一般對稱性提問、可變式本體論、與帶回異質行動者的洞見。最後本文並據此本體論政治觀點，提出在本地時空思考與使用其相關概念的「STS inside」策略。

Abstract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bo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By examining the mediation work of the hybrids, Bruno Latour proposes variable ontologies, parliament of things, and nonmodernity in order to tackle the modernist dualism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is proposition is criticized for its argument style, theoretical posi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its nonhuman political implication. This paper is not another overall evaluation of its nonhuman politics. It introduces STS' contribution in exploring the social politics of technoscientific practices and specifies ANT's insights into general symmetrical investigation, variable ontologies, and heterogeneous actor of ontological politic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ch an ontological politic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strategy of 'STS inside' to think with and use such an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in our local context.

一、科技與政治：非現代政治

《我們未曾現代過》是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領域中的健將 Bruno Latour 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以 Latour 為代表性人物、在 STS 領域有重要地位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主要理論建構之一。如同所有重要作品一般，這本在其理論脈絡有重要地位的著作，也在學界引起頗具爭議性的討論。

如果我們以 Latour 的幾本重要著作來定位 ANT 的理論建構，我們大致可以提出以下架構：首先，Science in Action (Latour 1987) 是關於研究方法的討論，而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Latour 1988b) 與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Latour 1996a) 則是其範例與研究方法教學。其次，附在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一書後半的 Irreduction 則提出其認識論架構 (Latour 1988a)，而論文集 Pandora's Hope 則有不少對此認識論層面的個案研究。至於，本書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則偏重其本體論建構，而 Politics of Nature (Latour 2004) 與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Latour 2005b) 則分別由本書的主要論點：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 以及類主體，在自然與社會存在的例子中進一步論證。在此架構下，本書的重要性在於提出新的理解自然與社會存在關係的架構，也就是本書中所謂的可變式本體論，或說行動本體論(林文源 2007)。這種新本體論架構，提供另一種理解歷史與世界的方法。

本書的主要論點為，由 ANT 的關係性萌生、中介、過程式，與異質存在觀點出發，Latour 力陳正視混種物(hybrid)的存在將如何改寫西方現代性，而將之重新定義為非現代性。

一開始 Latour 試圖論證混種物如何無所不在，卻在關於現代性形成的信念中持續受到否認與忽視(第一章)。Latour 認為這與現代性中，區分主客、社會與自然的純化(purification)工作，以及其不同代議體制有關：科學家為非人的物代言，而政治學家為人代言。而這純

化工作更藉由否認另一項中介(mediation)工作以及其產生的混種物的存在，而達成主客對立、社會與自然二分的宣稱。這種機制構成其現代憲章(modern constitution)的基礎。儘管STS已經開始逾越這種區分(如Shapin與Schaffer所做的，打破現代性誕生之初，科學中的社會與自然二分預設)，但卻未對稱地打破社會中主體與客體的二分預設。Latour認為，這些不可忽視的中介工作與其混種物，顯示我們其實從未如現代主義宣稱地進入現代(第二章)。

為此，他深入對於現代性提供理論基礎與定義的諸理論，顯示由康德以降的純化工作如何在各理論中拉大社會與自然的鴻溝。而當我們正視中介，不再視之為可被忽略的媒介時，我們發現主體與客體並非絕對的存在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多重混種的類主體與類客體(quasi-object)，而現代主義的單一本體論架構也成為可變的多重本體論(variable ontologies)。Latour並據此以非現代立場指陳前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缺失(第三章)。

如此，在承認混種物的存在後，西方的現代主義的獨特性消失，成為眾多文化的一種，但這不是回到一般的相對主義論。Latour以「相對主義者的相對主義」(relativist relativism)思考西方現代主義文化與其它文化的關係。他拒斥一般相對主義，他們為打破普遍性而不切實際地將所有文化視為對等，Latour加上第二重相對主義是為了帶回經驗事實：同樣的網絡化中介過程中，包括西方現代文化的各文化如何達成不同程度的穩定與影響。如此，西方現代性文化與其它文化相同，都是在混種物的異質網絡中構成，而其特殊之處則在於其否認類客體的存在，以及其類客體網絡連結分佈較遠(第四章)。

最後，Latour提出我們必須重視中介。他並以類客體構成的集體性重新定義社會與自然的存在、重新思考非人所中介的人文主義、以及如何正視現實，重寫非現代憲章，以重新將兩種代言體制合而為一而建立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第五章)。

這篇評論先簡介其衍生的相關批評，再提供理解本書的相關脈絡，提供讀者定位本書本體論政治論點的背景。最後，藉由以上這些介紹與討論的基礎，我將試圖提供讀者在異時異地閱讀這本著作時的策略。

二、非現代提案的可疑政治立場

本書在許多評論中，呈現相當負面評價。除了與其立場、風格有關的批評外，許多評論針對本書的政治承諾問題。

就一般論證內容與行文風格上，仍帶點正面意味的評價是如：儘管不同意本書論點，但閱讀本書提供了相當不錯的智力練習(Proctor 1995)；儘管本書論證不盡然有效，但卻提供了後現代思考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Tuchanska 1995)；這是重要且有啟發性的書，但卻充滿極為模糊的論證，以及奇怪的示意圖，甚至骨子裡其實還是後現代主義(Vogel 1996)。其餘批評則包括指本書藉由扭曲與簡化現代性的定義以立論(以及對對手哲學思考如哈伯瑪斯的簡化(Harbers 1995: 274; Vogel 1996: 442-3)；以好鬥姿態、暴力地簡化與攻擊對手論點(Kusch 1995)；他大費周章所爭論的物的議會，是環保運動早就已經承認的共識，但卻毫無理由地對這些事實絲毫不提(Harbers 1995)；本書對於知識生產過程、SSK等仍視為重要議題的辯論毫無貢獻，但是作者的機智與誇大立論則一定會吸引一堆趕流行的崇拜者(Collins 1994)。¹

針對其立論內容的質疑，則大多環繞著提出物的行動能力與相關政治性問題。這方面的批評已經有Lynch(1993:107-13)對ANT潛在的萬物有靈論的不安，以及著名的「膽小鬼」指控。在該辯論中，Collins和Yearly(1992)指出，ANT的符號學方法以假設性方式描述人與非人

1 這些批評與Bourdieu(2004)、Hacking(1999)等人對ANT的一般性評價有異曲同工之妙。

的可置換性，而宣稱其一般對稱性，是誤用了SSK的對稱性。SSK的對稱性有基進政治意涵，希望指出看似中立的技術問題，有相當人為的成份。Collins和Yearly認為，當ANT需要描述非人行動者時，由於ANT不具備對這些非人行動者的獨特知識，因此必然是借用既有的科技相關知識對那些物質（非人行動者）的理解，再用ANT的語彙將其重新描述過，如此，無可避免地解釋非人行動者時，「必然」將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說法帶進來。因此，ANT所宣稱的符號學方法的一般對稱性將「非人」帶進解釋架構中，甚至認為有時候非人可以取代人的工作等等，這些做法只是將SSK努力由科學家與工程師手中搶回的部分詮釋權，再次交還給科技專家。也因此，他們認為哲學上基進的ANT諸人在面對STS與科技專家的鬥爭中，反而是「認識論膽小鬼」（epistemological chicken）。²

針對本書，批評者同樣提出了類似的批評。在這些批評中，最為令大家不安與不滿的是，如同英國70年代的保守黨首相柴契爾的名言：沒有叫做社會的東西，而將責任歸諸於個人。本書更犯眾怒的是，進一步，大談類客體、混種物，與物的議會，似乎現在連人這東西都不存在了，遑論由人的身上進行政治歸因或批判。例如，Collins（1994: 674）堅持STS的政治策略的焦點是在個人與社會之間，而非人與物之間。將物帶進來只是混淆焦點。而且從來沒有所謂的非人類學家（nonhuman anthropologist），因為非人並無法自我社會化。一切總是人所造成的結果。同樣地，Vogel相當不安地說「（將類客體置於本體論的中心）是一種令人懷疑的物化，一種混種物拜物教，讓Latour將混種物，而非構成這些混種物的人類的作為，當成他的本體論的基礎。而且也是人類的作為，而非這些空氣幫浦，客體（不管是不是類客體）參與並不參與這些作為，它們也沒有參與調節這些作為的政治中。」

2 ANT的回應，請見Callon和Latour（1992）。

(Vogel, 1996: 444)簡而言之，在所有非人的背後，最終必須被追究責任的還是人(Harbers, 1995)。

關於這種非人本體論的批評，或許Latour與ANT諸人，還是會一以貫之地以他的核心想法回應：問題不是社會端或自然端，而是在這之間中介的過程。然而，顯然大多數的STS研究者，Bloor與Collins等，或許還包括Pinch與Bijker等，並未能被這種說法所說服(Bloor, 1999a, b; Callon and Latour, 1992; Collins and Yearley, 1992; Latour, 1999a)。³

三、從STS的社會政治到ANT的本體論政治

關於ANT的功過與本書提出的混種物、非現代相關爭議，在這評論的脈絡下，只介紹到此。尤其對非人政治性的爭議，在此並不擬提供一個超越時空的剖析。以下，本評論將試圖指出理解本書的相關脈絡，提供讀者定位本書論點的的背景，以介紹其本體論政治的意涵。最後並據此提出在異地時空使用其相關概念的一些策略。

STS的發展是由人文社會觀點，將對科學的提問由規範性，轉向經驗性面向，並不斷擴充其提問廣度與深度的過程。因此，STS一開始由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出發，揭露在一般認為的抽象、絕對理性與純粹方法之外，科學更為真實的社群與文化、組織與制度、實作與物質等面向，更進一步，這些提問拓展到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關連。

在這個學術領域的發軔背景，是二十世紀前中葉科學哲學家以規範性提問，極力思考、檢驗，甚至批判科學理性與理論地位(Kuhn 1977; Lakatos 1978; Popper 2004[1959])。在這種規範式方向之外，學者

3 在兩次工作坊場合與其私下交換意見的感覺。

另闢經驗式提問取徑。一方面，在偏向當代現狀的社會學取徑上，學者探討科學社群與其機構，在生產知識外，其本身作為社會部門之一社會制度與功能運作。研究焦點是科學家的社群關係、報酬系統與機構的制度性關連等社會學式的組織與制度問題(Barnes and Edge 1982)。重要代表之一為結構功能論的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Merton 1973)。⁴另一方面，在偏向歷史的取徑上，科學史作者則以不同於過去「勝者史觀」的寫作架構重讀科學史，以社群史的角度指出科學事實、科學知識、知識演變與爭議的集體與社群特質。在此，孔恩，與更早的Ludwik Fleck等，所提出的典範(paradigm)、思想集體(thought collectives)、科學革命等概念，提供重要的新洞見與分析架構(Fleck 1979[1935]; Kuhn 1962)。

由此，社會學與史學的研究逐漸落實經驗式提問：對科學，由其組織制度到知識內容，進行歷史與社會學式的探索，也就是由關注科學文化、組織，與制度運作等社會條件的「科學的社會學研究」(sociology of science)，轉變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SSK)。⁵在此提問下，進一步出現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strong program)、巴斯學派的「相對主義的經驗綱領」(empirical program of relativism)、俗民方法論與符號互動論的實驗室工作與科技軌跡研究，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ANT)等等，STS的探討焦點更深入科學知識的社群性格與知識實作。

早期STS諸取徑，受到愛丁堡學派，採取的認識論問題意識的影

4 在結構功能論的規範性觀點下，早期的經驗性研究卻相當帶有規範性的理想色彩。Merton為認為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其相關模式變項(pattern variable)，被稱之為科學意蘊(scientific ethos)：科學應該具有普遍性、中立、質疑、社群取向，都是一些相當規範性的理想類型描述(Merton 1973: ch. 13)。

5 見Steven Shapin's(1982)對早期此經驗研究取徑的全面性回顧。但這樣說不代表整體研究方案的改變，後來仍有不少堅持社會制度面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較著名的有Bourdieu(2004)。

airiti

響甚深，致力於檢視科學知識的「外部史」。不同於科學哲學以思辯方式、規範性分析科學知識如何可能、如何衡量理論與其再現的現實的關連等問題，研究者遵循愛丁堡強綱領中的核心因果與對稱性原則：不但錯的知識(信仰)需要因果解釋，正確的知識(信仰)也需要解釋(Bloor, 1976)。並將之擴充應用對稱考察科學知識。學者由此跳脫科學史的線性發展觀、勝者史觀，重新爬疏科學史料，並由重新理解科學史中原被視為混亂與岔路的爭議，產生許多著名的科學爭議研究。這些研究的重要貢獻是，藉由證實原本被視為外在於科學知識活動本質的機遇(contingent)因素，諸如社會想像、社會利益，與科學家信譽密切相關的社群活動等，如何與科學知識的形成與論爭密切相關，將一向被視為純粹的科學理性脈絡化，重現科學理論的競爭與知識發展軌跡的社會與政治過程。⁶

之後，對科學知識演變的脈絡化，逐漸由生產知識的社會活動，轉移到生產科學知識的核心活動與其社會影響，包括在實驗室中科技物與事實的生產，⁷與科技與社會交融的異質構成(heterogeneous constitution)等，⁸這些研究取徑大多碰觸到先前認識論層次思考外的本體論層次提問。在這趨勢中，關於知識與行動、知識與存在、科技物的客體性，甚至是科技活動參與者的主體性、社會性構成，都更廣泛地成為討論目標。在此逐漸擴大對科技活動的思考中，科技活動與社

6 關於知識社群性格的SSK研究，見Thomas Kuhn(1962)的典範研究，以及Harry Collins(1985)的相關經驗綱領。關於社會想像與社會利益論題，請見愛丁堡學派的David Bloor(1991[1976])和Barry Barnes(1977)。Donald MacKenzie關於統計學與階級利益的討論為經典例子。關於信譽、知識與科學社群的討論，見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1985)。

7 見Karin Knorr-Cetina和Michael Mulkay(1983)、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1986)、Latour(1987, 1988b)、Sharon Traweek(1988)、Michael Lynch(1993)、Harry Collins(1982a, b)、MacKenzie(1990)、Andrew Pickering(1984, 1995)、Emily Martine(1994)、與Knorr-Cetina(1999)等例子。

8 見Weber Bijker et al.(1987)、Thomas Hughes(1983)、Andrew Pickering(1995)、Bijker and Law(1992)、和Donna Haraway(1991, 1997)。

會脈絡之間的區別不再具有意義，使科技研究與科技的社會影響與關連的研究逐漸融會。甚至，這些研究成果也開始拓展到反省社會學等學科的基本預設與分析方向(Latour, 1996; Barry, 2001; Knorr-Cetina, 2001; Knorr-Cetina and Preda, 2005; Latour, 2005)。

ANT在由認識論到本體論轉變的交會點中出現。ANT的基本命題為，所有行動者都沒有預先確定的本質，行動者都是在網絡化過程中萌生的。在此方向下，一開始，ANT以符號學方法⁹分析科學文本，追溯科學「再現」(re-presentation)過程中，文獻的作用與歷程。這包括以實驗室的各種銘印(inscription)的軌跡與產生銘印的過程為主題，探討實驗室如何由無秩序的現象中，以各種概念、儀器與文獻產生特定事實的銘印(Latour and Woolgar 1986)；以及更有系統地以「行動中的科學」與「既成科學」的二分(science in Action v.s. ready made science)，分析各種陳述(statement)如何成為事實(fact)的過程(Latour 1987)。甚至包括，以追溯文獻而重構科學家(巴士德)的工作如何建構其網絡而轉變自身與其研究物的過程(Latour 1988b)。

另一方面，ANT也將符號學方法拓展為物質符號學(material-semiotics)，並應用在追溯「科技－社會集合體」(technosocial collectivities)，也就是現實世界構成的討論中。這包括早期對福特的電動車發展、干貝復育(Callon 1986a, b)，葡萄牙戰艦(Law 1986)、旅館鑰匙等著名案例研究(Latour 1992)，一直到後來更為全面地檢視科技活動如何中介科學事實的存在(Latour 1999c)，以及更為一般性地如本書對異質混種物對現代性構成，以及自然與社會構成的宣稱(Latour 2004, 2005b)，這些討論都與ANT亟欲探討的本體論政治(ontological politics)相關(Mol 1999)。

ANT的本體論政治核心創見在於：

9 關於ANT的符號學方法討論請見Latour(1999b)與Lenor(1999)。

(一) 貫徹STS的經驗式提問，以符號學取徑發展一般性對稱方法(物質符號學)，將物質面向帶入概念語言中。藉此將原本STS將專注於知識構成過程的研究取徑，提供一套概念化工具以更為精簡地理解這些過程的多種異質元素。為了達成此目的，在早期ANT大張旗鼓地創造各種語彙，試圖藉由行動體(actant)、行動者網絡、轉變(translation)、必要通過點(obligatory point of passage)等術語，提供對稱地理解異質元素在科技活動中的構成與變化。¹⁰ 這種一般對稱性視野，試圖解決STS初期面臨的雙重歷史的問題：一方面STS描繪科技發展的社會政治過程，而寫出無數的外部史，然而，這種外部史卻很難與傳統科技史技術發展觀點下的內部史結合。因此，人的歷史與物的歷史仍呈現各說各話。而ANT的一般對稱性則是解決此問題的重要嘗試(Latour 1999c)。不過，到後來一方面因為歷經批評，且也因為更為正視經驗事實的多重關連與變化，因此ANT已經逐漸放棄術語，改以視野自居，以便更有彈性地容納經驗事實(Law and Hassard 1999; 林文源 2007)。

(二) 提出中介式存在與可變式本體論架構。在ANT對事物存在的視野，相當不同於之前STS的分析架構，往往以穩定化的區別為基礎，而以既有行動者為分析單元，理解科技活動與事件發展，例如，愛丁堡早期以階級作為社會利益／旨趣(social interest)的展現。ANT對於探討不可化約的事物萌生過程有極大興趣(例如science in action一書書名所展現的)，也因此採取中介觀點思考事物的過程式存在。這牽涉到，本體論實體的中介與位移、客觀存在物的多重構成，與展演性本體論。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請見林文源(2007)，在此僅簡單介紹中介的意涵。

如前面對本書的簡介，中介與相關的混種物存在，以及引伸的多

10 關於ANT一些術語定義，請見Callon與Law等(1986)，Akrich與Latour(1992)，和Latour(1999c)。關於術語的操作，見Latour(1987, 1996a, 2005a)各階段的作品。

變本體論是本書的核心議題，整個非現代論證都立基於此概念。這概念的核心是，在ANT的萌生與關係性構成觀點下，沒有自然(例如基因圖譜)、社會(例如社會結構)、人性(例如心理構造)的終極存在等著我們去探索。事實上所發生的是，在產生社會與科技事實與物時，在操作中的異質中介融合(mediatory fusion)。如本書第三章中Latour論證波以耳的真空的本體論地位是多變的：沒有單一的本體論架構預先存在讓各種事物各安其位，各種研究也非只是去發現這些事物在此架構中的位置。

ANT認為單一本體論架構的觀點是事後追認的結果。然而，並沒有預先存在單一的本體論架構，本體論架構是在眾多中介的位移軌跡中構成的。一個較為容易理解的例子是Latour(1999c: 24-80)以遠在南美亞馬遜叢林中的土壤，轉變為在法國學術會議中的概念與符號的過程。他指出跟隨著土壤學家生產關於亞馬遜雨林的土壤的知識的活動時，雨林土壤被「本體論化」(ontologized)的各階段：「土壤」在對照卡、樣本、歸類架、數據、圖表、地圖、與報告等參照架構中，歷經一連串位移。當這些參照架構由一個循環到另一個，「土壤」也歷經了些許變動。每個參照架構都是一個融合關於土壤的概念、物質相關的行動，以及當下的土壤「本身」的中介(mediation)。在這意義下，Latour論說，土壤並非歷經科學家的再現，而成為概念。而是歷經許多中介的位移與轉變。藉著這些中介過程，土壤才由遠在亞馬遜雨林的不知名某處的模糊事物，被轉換為我們意識中所認識的特定認知狀態。因此，這些中介活動非但不可化約，更是土壤的本體論化事件本身。

因此，科學的知識活動並非是認識論問題，更牽涉到本體論化構成，與更基進的本體論多樣性的問題。西方哲學的主客二元論(dualism)，以及自然科學的實在論與社會科學的建構論的對立，只是因為忽略這中介行動的過程：她們要不苦思外在的物(things out there)如何與內在的心靈(mind in here)發生關連，便是極端地以某端(社會

或自然)化約另一端(自然或社會)。正如生產人造物創生新客體而介入世界一般,生產事實也是對現實世界的本體論介入:創造與認識科技事實與科技物的活動都是一連串的中介鍊,在其中事物歷經細微與多種位移,使事實與世界成為其所以如此的樣貌。這也就是為何Latour在本書與他處(1993, 1999c)提議以「實作論」(pragmatogony)取代宇宙論來理解物質如何在實作中構成,而非其先驗的本質存在狀態。也就是多變本體論或行動本體論。

在此觀點下,物質是被促動(enacted)、展演(perform)的結果:由轉變工作中的某種狀態(state of affairs),成為一種事實(a matter of fact),一直到最後在被穩定的網絡中成為理所當然的存在(a matter of course)。實作論的基本想法是因為現實是如此精心地受人為介入,它們才能如此真實、自主,且獨立於人而存在。其中,客體並非外在於我們而存在於世,而主體也非存在於我們的語言架構與心靈中,客體與主體的本體論地位是處於行動的過程中的。現實作用中的物、語言、人的運作,都是在開展當下現實,而非指向另一個層次、脈絡,或更真的現實。

(三)帶回異質的行動者。如Latour所說,傳統對於現代性的看法,大多將之定位在啟蒙理性的意義下。在知識與科技上,實證科學的發展與工業革命的創舉是人類對自然的掌握,以及在社會與政治上,以自由理性主體為基礎的民主政治是人類對自身命運的掌握。在這些看法中,關於人與自然的知識共存於一個以人的行動能力(human agency)為中心的本體論架構中。一方面社會科學,試圖更清楚地釐清與掌握人的行動能力(除了政治與社會思想,還包括Latour未探討的心理學與精神分析[Foucault 1965, 1979; Hacking 1999])。另一方面,自然科學則更有效地將物建構為更服從於人類意志的工具與環境。這種現代性本體論架構在殖民與全球化的各種過程中,因為展現相對於其它文化的優勢武力,似乎更證實其普遍有效性,也更進一步加強世人

對這本體論架構的信心。在此過程下，現代主義的成就一方面成功地除魅，破除前現代思維中對各種異質的行動能力的「想像」¹¹，另一方面，則藉此更明確地將人置於世界的中心。由此，科技物處於弔詭地位：一方面，現代歷史的重要特徵之一便是科學知識與技術物對人類處境的劇烈影響，然而，在相應的本體論架構中，人卻又成為唯一的行動者。這種主客分離的本體論架構，正是Latour面對前現代、現代、後現代論者的最大論點(第三章)。

正如STS的重點之一便是在探索科技在此過程扮演的角色，ANT又是STS中最為重視這種矛盾者，而提出本體論政治的意涵。但如下節將提到，也為此引來無數爭議。這爭議的重點，主要來自批評者，無視於中介構成，而質疑ANT提出的物的行動能力，及其政治性。

那麼要如何理解ANT所謂的「作為行動者的物」呢？基本上，ANT結合中介與關係性萌生基本觀點，正視物在網絡化過程中的作用。要瞭解這一點可以由兩端趨近：一方面，由異質構成的觀點，提出物對人／社會現實構成的介入。另一方面，由本書中Latour所指出的「事實拜物教」(factish)，找到人對物／自然事實構成的介入。

一方面，社會學者以現代主義的主客對立為基礎，將社會構想為由互為主體的理性、規則與關係所構成的。社會因此是人們自身的存有集合(people-among-themselves)。社會學的古典論題之一是社會秩序的問題。古典社會學傳統之一將社會視為如事物一般集體存在(social facts as things)(Durkheim 1964)，而社會秩序則被解視為獨具一格的特質與影響的社會結構所造成的(Porpora 1987)。在這種想法中，社會結構被視為是一種不能被化約為微觀互動的巨觀面向，因此呈現不受各

11 例如，現在已經在此現代主義架構中被視為文化面向的象徵意涵的知識。例如對山川、動物、神靈能力的敬畏與將這些能力納入對世界的解釋的宗教世界觀與原住民的口語傳說等。相關研究請見Chakrabarty(2000)。

別個體行動影響的相對穩定狀態。此外，社會結構也是一種社會客體，因為它不能被化約為個體心裡或生理構成的互動後結果。在此構想中，社會的存在預設了不可相互化約的社會個體與結構的二元本體論架構。

ANT的異質本體論挑戰這種純粹且抽象的社會觀(Law 1991)。ANT認為位於網絡中的主體，如同客體一般，是因為身處異質網絡而成為某種行動者，較為著名的說法，有如「異質集合體」(hybrid collectif)(Callon and Law 1995)、「異質工程師」(heterogeneous engineer)(Law 1987)，與「計算中心」(centre of calculation)(Latour 1987)，以及構成互為主體性的互為客體性(inter-objectivity)(Latour 1996b)等。在本書的中介觀點中，Latour更指出經由且唯有與混種物存在而存在的人，應該是以各種異質「擬型」(morphism)交織而存在為某種人。

而進一步，社會的存在也是如此。在Pasteur的案例中，Latour(1983)指出探討Pasteur作為社會行動者的方法是去看他在法國社會中加入了哪些新的力量。如之前所指出的，當時地位不明的微生物從小至牛奶腐壞，大至受疫情威脅的整個國家等不同規模的場域都發揮重要影響。藉由Pasture在實驗室的微觀工作中促成轉變，Pasteur成為微生物唯一的可信代言人，他的工作既是微觀亦是巨觀的。不但改變微生物與自身，最後更將整個國家放在以他的實驗室為支點的槓桿上，改變社會生活，而他的實驗室便成為「少數能夠將扭轉社會脈絡的地方之一」(Latour 1983: 158)。在此轉變模型中，個體存在與行動、社會權力、社會結構的存在不是外在於彼此，或有大小之分，他們都在行動本體論中被中介與位移而相互混雜，對彼此產生影響。因此，Pasteur之所以為Pasteur乃是因為他是與實驗室、微生物等等諸行動者所連結而成為的「微生物的巴士德」(Pasteur of microbes)(Latour 1983)。¹²

12 Latour(2005b)對社會學論述作了總體檢，並由異質中介的角度提出sociology of association的名目，重新界定行動本體論意義下的社會與社會學。

另一方面，同樣地，物也不是本質地擁有行動能力。Latour巧妙地轉化將原本在批判主義傳統中的「fetish」(拜物教)為「factish」(事實拜物教)。原本拜物教批判者認為，在人們所執著與誤認的事實背後，其實是受人為建構所造成的。Latour將這種「揭開背後現實」的批判，轉化為事實拜物教，反對這種批判背後隱含對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立場，同樣執著於「事實」。自然科學的實在論認為：現實存在之所以是真實的，是因為它們是未經人所介入的存在，而如果受到人為操弄與干擾便是可疑的(例如，實驗必須排除人為干擾與錯誤)。社會科學天真的建構主義則認為：人們往往對被建構的現實堅信不移，而我們必須破除拜物教心態(fetish)建構的社會現實後，我們才能看到「真正」的社會現實(例如，一塊被信徒與乩童們視為具有靈力的石頭，在建構論者眼中只是一塊被信徒們投射了其信念與慾望的石頭，而其中信仰社群的權力關係才是背後的真正社會現實)。

但由實在論觀點下提出的事實拜物教批判來說：現實無法不經人為介入而被認識，而且現實存在也永遠非外在於人的介入而存在。所以，實在論眼中的未受人為介入的現實是因為人們如此精心打造現實，又排除自身人為作用的痕跡，才顯得如此獨立存在，而儘管建構論者總是認為一般人無法看穿其信仰的現實背後的真正人為影響，但建構論者也無法看到其所信奉的拆解拜物教信念後的真正現實，也同樣受到人為作用才如此真實(例如，以權力概念探討社會關係是在研究活動中成為被認識的現實，甚至，這些概念後續被用於了解社會、社會行動與制度化而更穩固地造成現實)。同理，如同前面對中介與可變式本體論的討論。微生物之所以為我們所認識，且我們依照這認識而改變操作與生活方式的微生物，而非先前衛生學家所揣測的其它莫名力量，乃是因為它與實驗室、巴士德等等諸行動者所連結而成為的「巴士德的微生物」(microbes of Pasteur)。

因此，正如主體並非人自身而存在，客體也非物自身的存在。客

體的行動能力，如主體一般，也是在網絡化中介過程中被形構。如果可以由各種異質「擬型」(morphism)交織理解人類行動者，與其行動能力構成。那麼，我們同樣能夠以各種擬型與黑盒化過程去理解物的行動能力。

四、STS inside：面對在地處境的有效思考

遵循著ANT的經驗式取徑的本體論政治思考，在異地時空評介本書，重點或許不再是回溯既有時空的學術、社會與政治論爭，而是藉機定位在異地時空使用相關概念的策略。目前希望藉此討論在地有效的政治性。

由ANT視野中，力圖追溯各種行動體在知識與存在交織的本體論化過程的中介思考來說，這個非人政治性問題，並沒有太大意義。一則，就本地脈絡來說，人與非人的辯論，或現代性辯論，從來不是本地社會知識理念脈絡的重點。本地社會的確引介了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甚至包括本書的非現代主義。但是，當有多大程度上這些理念成為學術現實，而多大程度上又成為社會現實尚在未知之數時，斟酌人與非人意義不大。再則，就STS研究對物質性的啟發而言，脫離由人為出發點、旨在為人且總是經由人的政治策略，而提出對非人混種物的重視，並不消極地表示現實處境與政治策略是與人無關的。

相反地，正如STS積極思考知識與科技物如何形構社會生活與資源分配，這是積極地，在去人中心(de-human-centered)的轉向後，在策略上擴大到非人的領域與對不同政治實體的敏感度，而在價值上則保留以人為重(human-laden)的政治關懷。¹³在這意義下，儘管最終必須被追究責任的還是人(Collins 1994)，且總是人／社會的作為造成一

13 許多互動論研究者，在大方向上同意ANT的本體論，但在政治上，選擇這種以人為重的策略(Clarke, 2005; Fujimura, 1991; Leigh-Star, 1991)。

切，但是，在現實意義上來說，當這些人／社會作為已經歷經重重網絡中介而呈現多種異質狀態，卻只將人當成最初的源頭與最終的「根本」、「終極」解決方案，即便真正能解決與追究了人／社會，並不見得能解決什麼。因為那些中介物仍然存在且發揮作用。

在這種觀點下，我們要如何理解這本著作？受到引介的本書，當然在其原生的社會時空、理論脈絡，與學術論辯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如此大費周章地評論本書，並不只是為了引介，除了讓大家領略Latour與ANT的思考理路與相關脈絡外，更希望讓讀者能帶有距離地思考這本書。也就是說，在忠於ANT的思考風格下，本評論希望能提供讀者的閱讀與思考方向：不是生硬地吞下本書的論點，而是能消化本書論點，並實際帶著這種視野，拓展對自身立足的社會處境的思考與實作。前者是較容易的且並不需要本評論；而後者是較難的，也是本評論的首要任務：對讀者進行ANT式的轉變(translation)工作。

這是我對當前在地時空下，STS研究者的策略建議與工作期許：理解與創造。這些與ANT及本書的主要論點：中介、實作本體論、多重與異質行動能力有關。如果考量多重、異質行動能力的構成，那麼我們必須超越對自由主體與社會結構／科技體制的對立：不再是一種由超然的立場或道德標準提出的簡短的道德訓令，將問題歸咎於某些群體或大機制，或化約為某種對人、弱勢群體的能動性的浪漫情懷之類的，一了百了(once and for all)的解釋(Gomart, 2004; Timmermans and Berg, 2003)。而是一種置身事內、深入理解科技、社會、行動者，如何在實作中交互構成的描述(Latour, 1988c, 2002)。唯有瞭解不同時空脈絡下的科技與社會生活在實作中的構成紋理：行動者是如何多種與異質、多種行動者的處境如何被穩定與協商，而這些不同樣態的軌跡又交會與衝突，才能就具體本地經驗，重構多重世界觀與多重實作過程所建立的本體論化世界(林文源，2006)。

然而，這些理解並不會自然有效，它們還必須輔以創造連結的工

作。置身事外的批判，極難成功，因為能動員的行動者非常少，往往就是文字論述與道德評價。置身弱勢的批判，能夠發揮效用的可能性增強，因為行動者增多了。但是，就改變現狀而言，道德與立場上的正確不總代表策略的適當。如同科技活動必須進行大量連結，以轉變 (translation) 諸多元素成為同盟者。同理，STS 研究／行動者也必須讓自己「有用」：唯有能為其它行動者所用，才能夠與多重行動者合作，進行相互轉變。

如 Latour (2005b: 141-58) 所說，Intel inside，標誌著 Intel 藉由其晶片牽動著世界上的眾多電腦，甚至產業。除了追溯本地科技構成的社會紋理，STS 研究者還必須作類似工作：藉由對本地科技與社會實作樣態的瞭解，發展諸多策略，讓 STS 與諸多實作者 (科學家、工程師、醫護專業、政治決策者、行政人員、不同性質的「民眾」) 發生連結，而轉變 (translate) 各種帶著不同 STS 觀點或分析能力的「STS inside 實作者」。¹⁴ 這是本評論希望促成的讀法，希望能有助於探索在 ANT 非現代意涵下的本地政治實踐。據此，ANT 的非現代政治性，若能與本地實作、實作者發生有效連結，屆時 ANT、非現代、非人政治性等概念與 STS 研究與行動者必將 (在正面意義上) 變形，脫離本書中的定義與論爭脈絡而另起爐灶。

參考文獻

林文源

2006 〈探索文化的紋理：一個文化上的思考〉，收錄於周平、齊偉先主編，《質性研究的越界：文化現象的分析》。嘉義：南華大學。

2007 〈論 ANT 的行動本體論及其政治性〉，《科技、醫療與社會》，4 期，頁 65-108。

Akrich, M. and B. Latour

1992 "A Summary of a Convenient Vocabulary for the Semiotics of Human and Nonhuman Assemblies," in W. Bijker and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14 Foucault 也有類似想法，他相當重視在專業化、科技化的世界中，特殊型知識份子在知識／權力關係中的策略性地位 (1972/1980: 128-9)。

-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p.259-264.
- Barnes, B.
- 1977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arnes, B. and D. Edge eds.
- 1982 *Science in Context: Readings in Sociology of Science*. Milton Keynes: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arry, A.
2001. *Political Machines*.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Athlone Press.
- Bijker, W. et al. eds.
-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Bijker, W. E. and J. Law eds.
- 1992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olog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Bloor, D.
- 1999a "Anti-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0A(1): 81-112.
- 1999b "Reply to Bruno 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0A(1): 131-36.
- Bourdieu, P.
-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allon, M.
- 1986a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196-223
- 1986b "The Sociology of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n M. Callon, J. Law and A. Rip ed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Re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Callon, M. and B. Latour
- 1992 "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School!" in A. 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43-368.
- Callon, M. and J. Law
- 1995 "Agency and the Hybrid Collectif,"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4: 481-507.
- Callon, M. et al. eds.
- 1986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Re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Chakrabarty, D.
-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A. E.
- 2005 *Situational Analyses: Grounded Theory Mapping After the Postmodern Tur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Collins, H. M.
 1982a “The Replication of Experiments in Physics,” in B. Barnes and D. Edge eds., *Science in Context*. Milton Keynes: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2b “Tacit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Networks,” in B. Barnes and D. Edge eds., *Science in Context*. Milton Keynes: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nging Order: 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 London: Sage.
 1994 “Review of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Isis* 85: 672-674.
- Collins, H. M. and S. Yearley
 1992 “Epistemological Chicken,” in A. 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301-326.
- Durkheim, E.
 1964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 Y.: The Free Press.
- Fleck, L.
 1979[1935]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
 1965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2/1980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N.Y.: Pantheon Books, pp.109-35.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Y.: Vintage.
- Fujimura, J.
 1991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Where Do We Stand?” in D.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Essays in Honor of Anselm Straus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Gomart, E.
 2004 “Surprised by Methadone: in Praise of Drug Substitution Treatment in a French Clinic,” *Body and Society* 10(2): 85-110.
- Hacking, I.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away, D. J.
 1991 *Simians, Cyborg,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Y.: Routledge.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 N.Y.: Routledge.
- Harbers, H.
 1995 “Review of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 270-275.
- Hughes, T. P.
 1983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norr-Cetina, K.
 1999 *Epistemic Cultures: How the Science Make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 University Press.
- Knorr-Certina, K. and M. Mulkay
1983 *Science Observed*. London: Sage.
-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Objectivity, Value Judgment, and Theory Choice," in Kuhn, T., *The Essential Tens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Kusch, M.
1995 "Review of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8: 125-126.
-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Latour, B.
1983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in K. Knorr Cetina and M. J.
Mulkay eds., *Science Observed*. London: Sage, pp.141-170.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a *Irreductions: Part two of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b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c "The Politics of Explanation: An Alternative," in S. Woolgar ed., *Knowledge and
Reflexivity: New Frontier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efacts," in W. Bijker
and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olog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arlow, England: Longman.
1996a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b "On Interobjectivity," *Mind, Culture, and Activity* 3(4): 228-45.
1999a "For David Bloor ...And Beyond: A Reply to David Bloor's 'Anti-Latou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0A(1): 113-29.
1999b "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M. Biagioli ed.,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276-289.
1999c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ty Press.
2002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http://www.ensmp.fr/~latour/articles/article/089.html>.
2004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and S. Woolgar
1986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w, J.
1986 “On the Method of Long Distance Control: Vessels, Navigation and the Portuguese Route to India. Power,” in J. Law. ed.,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7 “Technology and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 The Case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in W. Bijker, T. P. Hughes and T. J. Pinc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pp.111-134.
- Law, J. ed.
1991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London: Routledge.
- Law, J. and J. Hassard
1999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Oxford: Blackwell.
- Leigh-Star, S.
1991 “Power, Technology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ventions: On being Allergic to Onions.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in J. Law ed.,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38*. London: Routledge.
- Lenor, T.
1999 “Was the Last Turn the Right Turn,” in M. Biagioli ed.,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290-301.
- Lynch, M.
1993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Kenzie, D.
1990 *Inventing Accurac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Nuclear Missile Guid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Martin, E.
1994 *Flexible Bodies: 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Boston: Beacon Press.
- Merton, R.
1973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l, A.
1999 “Ontological Politics: A word and Some Questions.” in J. Law and J. Hassard. e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Pickering, A.

- 1984 *Constructing Quarks: 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5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pper, K.
2004[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Routledge.
- Porpora, D. V.
1987 *The Concept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Proctor, R. N.
1995 "Review of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American Scientist* 83: 384-384.
- Shapin, S.
1982 "Historical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 *History of Science: An Annual Review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20: 157-211.
- Shapin, S. and S. Scaffer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mmermans, S. and M. Berg
2003 "The Practice of Medical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5(Silver Anniversary Issue): 97-114.
- Traweek, S.
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uchanska, B.
1995 "Review of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62: 350-351.
- Vogel, S.
1996 "Review of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 2: 442-446.